

软约束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综述

黄小勇, 陈运平

(江西师范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经济增长历来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相继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后,非物质因素引起学者的关注。文章对研究社会资本、精神资本、体制机制等“软约束因素”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逐一评述,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空间。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精神资本; 体制机制;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0098(2012)01 - 0040 - 07

经济增长是工业化时代以来各国热衷和追逐的事情,诸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李嘉图、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马歇尔、创新理论之父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集大成者库茨涅茨、起飞理论缔造者罗托斯、构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哈罗德和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代表人物索洛和斯旺、新剑桥增长模型提出者罗宾逊夫人、帕希内蒂和卡尔多、反增长理论代表人物米香、零增长理论的提出者梅多斯和福雷斯特、经济增长因素理论代表人物肯德里和丹尼森等^[1]。肯德里从生产要素投入总量的增加量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角度剖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丹尼森在肯德里的基础上将投入总量进一步划分为更细致的变量,比如劳动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而且还要有质的提高。^[2] 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历来都是经济学家们考察和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得到创新和完善。主流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更加倾向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对社会资本、精神资本和体制机制等因素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在此,论文把这些因素界定为软约束因素,在此理论背景下,本文对社会资本、精神资本和体制机制等“软约束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为进一步研究“软约束因素”对江西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理论支持和依据。

一、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

(一) 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

最早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是法国的皮埃尔·布迪厄。他提出,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但并没有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具体的分析。而美国的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勒曼在《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所具有的,表现为社会资源的一种资本。罗伯特·帕特南在其名著《使民主运转: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1993)》中,认为意大利 20 个地方政府的业绩同公民参与精神和协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罗伯特·帕特南强调了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作用,但他所关注的是政府业绩和社会资本的关系。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认为社会资本是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合作的能力,是一系列社会美德的统称,包括诚实守信、对他人的责任感以及善于合作。社会资本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人美德。尽管有关社会资本概念的确切涵义仍然争论不断,但是奥斯特罗姆(2000)对社会资本的特征做出了概括:对于个

收稿日期: 2011 - 12 - 05

基金项目: 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课题: 地区工业化进程与劳动力就业研究——以江西为例(3540)

作者简介: 黄小勇(1977 -),男,江西石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战略管理;

陈运平(1973 -),男,江西奉新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人力资源管理。

人所组成群体发生重复行为的作用模式所形成的共享知识、理解、规则、规范和期望。^[3]邱国景(2006)认为社会资本边界不仅是一个量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在社会资本边界的确定过程中,假定社会资本存在以下四种类型:不规则离散型社会资本、规则离散型社会资本、不规则连续型社会资本、规则连续型社会资本。^[4]

(二)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社会资本的提出,自然会引引起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者的注意,并应用其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刘炜(2006)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信任通过限制机会主义行为来降低签约的交易成本,从而鼓励资本投资;共同的规范和准则可以减少搭便车行为,有利于鼓励地方公共物品的自愿供应;协会网络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来影响经济增长。^[5]陈英、王立云(2007)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讨论了诚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科斯定理为依据,认为诚信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则,它也是市场经济其它制度正常发挥作用的基础,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着影响。^[5]殷德生(2001)认为,社会资本、有效政府与经济发展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以及有效政府的前提条件。^[6]牛艳红(2007)则分别从社会资本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论述。^[7]奥尔森认为,协会组织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协会的活动可以增强信任,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协会可以因为自身或成员的利益从事寻租活动,通过院外游说增加不必要的社会成本。^[8]但无论如何,信任和共同的规范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效的衡量社会资本,并理清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程度是非常重要的。

(三)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赵延东、罗家德(2005)将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总结为两大类:在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多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个人网络中蕴涵的资源进行测量。而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重点主要集中于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联结和规范这几个方面。^[9]卢燕平(2007)将社会资本引入投资模型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均衡模型,构建了社会资本—交易成本—市场经济发展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模型。^[10]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专家学者提出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刘璐琳(2008)从社会资本各维度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认为社会资本并不是生产函数的独立投入要素,而是其中的重要转换要素,其主要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物质资本投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及正式制度等方式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11]杨宇、郑垂勇(2008)采用截面数据回归分析法及时间序列数据协整分析法对中国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信任和民间组织与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我国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而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是我国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一。^[12]尹希果(2006)采用中国2000年的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了包括信任指数在内的、影响工业集聚水平的变量对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认为,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影响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13]邱国景(2006)则针对社会资本的总效用问题,建立了一个社会资本的总效用函数,进而引申出社会资本的最优规模,确定社会资本的边界,试图解释和验证社会资本的规模最优化问题以及社会资本的不同结构类型的效用差异。^[14]

(四)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为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模型,诸多的专家学者在此基础上做了相应的实证探索。李普等(2008)在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研究社会资本与GDP增长关系,建立计量模型并得出结论:中国中西部的诚信水平不同;诚信与市场活跃度、房地产投资、金融市场发展等变量之间的关系表明,作为社会资本重要内容的诚信从不同层面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诚信的建设尤为重要。^[15]刘耀祥(2007)选取如下5个变量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题项,即:对全球化态度、民族文化、适应性、社会价值、社会公平,构建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概念模型,并利用最新的IMD世界竞争力年鉴的相关数据,对研究的概念模型进行检验表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通过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可以促进经济增长。^[16]郑耀群、周新生(2007)考察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认为东西部经济差距问题,除了用物质投入、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的高低加以解释以外,社会资本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7]张庆、康建英(2006)

亦认为,和东部地区相比较,西部的社会资本已经阻碍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优势,增加了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并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西部在加速市场化进程中,在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改变及其与市场经济的内在适应应为其政策的支撑点。^[18]赵晓(2004)对比分析了江苏和温州的经济发展,认为温州起步是私营经济,而江苏是因为乡镇企业。因为温州具有强大的社会资本,人和人之间的诚信使得温州易于建立起地下金融体系,而江苏却缺乏这样的组织。^[19]张克中(2005)考察了社会资本与湖北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社会资本与信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有较丰富资源与便利交通的湖北省诚信水平较低,制约了经济发展。湖北省需要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资本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湖北经济发展模式。^[20]朱中华、汪啸林(2004)则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指出:江西经济发展的障碍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缺乏,而且也包括信用等社会资本的缺乏;江西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投入资本、人力、技术等经济资源,也迫切需要社会信用等社会资本的介入;政府部门应当成为信用这一资源的主要供应者。^[21]

二、精神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

(一) 精神资本的基本内涵

在学术史上,直接提出和使用“精神资本”概念的首先是历史学派创始人李斯特(List, Friedrich)。他在《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精神资本”一词。他写道“把一国生产力局限在其物质资本上,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生产力的更大的组成部分在于个人的智力和社会条件,对此我称其为精神资本(geistig kapital)”。^[22]在1841年出版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把“精神资本”定义为“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或政治环境中所汲取的精神力量和体力”,是“一国身心力量的总和”。^[23]西尼尔(Senior, Nassau William)在其最早发表于1826年的《政治经济学大纲》这一代表作中写道:“就我们现在的文化状态而言……我们智力和精神的资本,不但在重要意义上,甚至在生产力上,都已超过有形资本。”他在考察当时爱尔兰经济落后的原因时指出“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和智力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和智力上没有能获得充分发展。”^[24]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约翰·穆勒(Mill, John Stuart)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精神资本”这样的术语,但却十分强调劳动者的“士气”、“诚实的品行”、“合作精神”等因素,在提高劳动生产中“劳动干劲”列为生产力较高的第二个原因,并认为“有规律和习惯性的”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是人类取得任何伟大进步的必要条件。”^[25]马克思也十分重视精神因素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他指出:(劳动)“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机器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就越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26]构成精神资本的具体内容从经济增长的逻辑和历史过程来分析,罗卫东(2001)认为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特定的经济观念、企业家“创新”精神、劳动态度和组织的“精神资本”——企业文化。^[27]但精神资本并没有被公众明确认可的外延边界。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很大分歧,参照早期经济学家的理论,后来的相关研究都有明显的分化。李向民(1985)认为以精神产品生产、消费、传输为主的精神经济形态已经形成,精神时代已经到来。精神产品被当作新的投入与产出要素,精神产品既是精神资本,又是人们消费的对象,满足人们求知、求审美的体验性的精神需求。^[28]

(二) 精神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鲁传一、李子奈(2000)认为将企业家精神引入经济增长理论,需要强调一些基本假设,主要是:企业家在经济系统之内,是经济系统内的一种重要资源,是从整个经济的劳动力中产生的;整个经济都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均衡,但经济都具有趋向均衡的趋势;对于某一企业家来说,他的行为过程中存在可以用概率来度量的风险和不能用概率来度量的不确定性。^[29]秦其文(2007)基于发展经济学的论述,认为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或路径有如下四条:一是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者素质提升→理性化经济行为→经济发展;二是思想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交易费用节省→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三是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四是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30]韩

顺法、李向民(2009)把精神资本状态量与过程量分别称为:外在的精神资本和内在的精神资本。外在精神资本是人类精神活动或精神生产的产物,即精神产品。在此基础上提出精神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有四条路径:路径一是内在精神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路径二是内在精神资本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增长要素;路径三是精神生产带来了技术创新与知识积累,并产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路径四是这是一个间接反馈过程,是内在精神资本形成的关键环节。^[31]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现有研究也是意见纷呈。熊彼特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通过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阿罗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知识溢出进行的,知识溢出会促进增长,但是,知识并不会自动变为有用知识,在知识和有用知识之间存在一个“过滤器”的机制,Acs ZJ(2004)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这样一种推动知识溢出并商品化的机制,尽管它不是唯一的机制。^[32]叶勤(2000)认为企业家精神通过创新和创业两种机制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表现在基于技术创新的高科技企业和基于业务创新的非技术类中小企业的大量创办以及大企业内部适应变革的种种组织、业务和技术创新。^[33]肖建忠、唐艳艳(2004)在大量阅读了国外有关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后认为,企业家精神通过三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竞争、创新和创业。^[34]

(三) 精神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实证探索

关于企业家精神测定标准,目前研究主要借鉴了产业经济学领域的成果。迄今为止,企业家精神测定维度主要有自我雇佣比率、所有权比率、企业的进入退出比率、小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和市场参与创业人数等。但尚没有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测度方法。探讨企业家精神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文献近期虽有些发展,但依旧非常有限。David Audretsch 和 Roy Thurik(2001)从一个国家角度探讨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Audretsch 和 Thurik 发展了 Romer(1986)和 Krugman 等人的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企业家精神通过知识的扩散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35]在实证分析上,Audretsch 和 Thurik 用了两个指标分别来衡量企业家精神,一个是小企业在市场中的相对份额,一个是自我雇佣比率。他们提出了“最优产业结构”模型来定量研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Linghui Tang 和 Peter E. Koveos(2004)研究了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首先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风险企业家精神(VE)与创新企业家精神(IE)。通过 TEA 指数与 GDP 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他们得到的结果是,风险企业家精神和 GDP 的增长率呈现正相关性;在高收入的国家,创新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是对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相关性并不明确。^[36]何予平(2006)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经过变形加入体现企业家精神的变量,得到如下生产函数方程: $Y = Ak^{\alpha}L^{\beta}e^{f(ET)}$ 在此模型基础上得出企业家精神越活跃经济增长将越快的结论。^[37]沈坤荣、孙文杰(2009)将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归结为三类:物质资本、劳动力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通过模型分析,认为现阶段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各要素中,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仍然最大,而 R&D 投入、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小。^[38]杨宇、郑垂勇(2008)分别定量分析了我国东部、中部及西部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各地区企业家精神对相应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等。^[39]高彦彦、杨德才(2006)分析了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的崛起,认为只有区域文化所遵循的内涵与制度环境所倡导的价值体系相一致时,文化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激励作用,否则,文化的作用将被制度“锁定”。^[40]余达淮、银娟(2004)分析了道家思想对东亚经济的影响,认为,道家注重整体和谐的思想,是东亚国家群体主义企业文化和相关经济政策、制度制定的基础。这种群体主义思想不仅促进了东亚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赶超,而且对东亚社会的经济平等和实质性贫困的减少也有积极作用。^[41]

三、体制机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

“机制”一词,原意是指机器、机械、机构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来逐渐地应用于生物学和医学,用来表示生命有机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如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各自的相互作用产生特定的功能,从而维护生命有机体的正常活动。“机制”一词用于经济学中,大约是 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经济形态作为社会有机体,必须依靠自身经济机制的功能,才能维持整个经济过程的运行和发展。目前,我国学者关于体制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但都认为体制机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

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廖飞(2004)认为,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体制机制差距的体现主要有: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所有结构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缩小体制机制差距的几个思路:加快市场机制建设和对外开放程度、健全法制环境和政策氛围、加快国有经济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42]李应振、李玉举(2008)亦认为,从深层次上看,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机制的束缚。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保障。^[43]姜作培、陈峰燕(2008)认为,目前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大多与现行的体制机制不够合理、不够完善有关。^[44]

关于体制机制对经济增长实证分析是学术界的一大难题,现有研究较少。李应振、李玉举(2008)选择五大类指标构建测度模型,第一类指标是市场和政府方面,具体包括市场化指数、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三项指标;第二类是所有制结构方面,包括非国有经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三项;第三类是科技创新与人才机制方面,用“各地区R&D从业人员”指标^[43]来衡量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人力资本,常用的测算方法有两种:一是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二是各种受教育程度人数的比重;第四类是经济开放度,外贸额/GDP即贸易依存度和利用外资额/GDP两项指标表示;第五类是社会服务水平方面,用教育经费支出、科技三项经费支出、卫生经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四项指标衡量。利用所建模型对我国各省进行测度,得出:我国东部地区省份的体制机制比较完善,而中部、西部省份比较落后。^[44]这与人们的感性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四、文献评述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理论不断被完善,考察经济增长模型,可以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以下三大方面:(1)资源约束。包括自然条件、劳动力素质、资本数额等方面。(2)技术约束。技术水平直接影响生产效率。(3)体制约束。体制规定了人们的劳动方式、劳动组织、物质和商品流通、收入分配等内容,规定了人们经济行为的边界。但是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并不能概括所用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理,这就必须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新的因素。

为了弥补经济增长模型的不足,一些学者开始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研究视角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社会资本的内涵和界定、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社会资本如何量度、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以及特定区域社会资本的考量。根据一般的论述,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资源,即存在于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资源,它体现为:个人关系、成员身份、社会网络、信任关系。其中核心要素或基础要素就是信任关系。之所以把这些要素称作“社会资本”,一来是因为它们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二来是因为它们可以带来增值,是无形资产。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学者的认可与证实,但是对于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点机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因素,社会资本的度量是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合理度量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是以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两个方面。

同时,精神资本也提到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精神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为人提出了我们行为动机的最终目标和终极价值体系。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精神资本要素已备受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与当地文化的关系、探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目前,对精神资本的研究主要是精神资本的内涵和外延、精神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精神资本的度量等方面。然而关于精神资本的外延在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观点,如何合理度量精神资本及如何有效发挥区域文化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中,体制机制因素已引起学者的重视。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除了“历史因素说”、“地理优势说”、“政策倾斜说”外,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最深层次最重要的原因。制度经济学强调体制机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关于体制机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特别是关于体制机制要素的度量没有有效的一致解决方法,这将值得进一步研究。

综上,在研究经济增长中,非物质因素已备受学者重视,关于社会资本因素、精神资本因素、体制机制因

素等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多。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时,系统的综合的考虑上述软因素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邹铁钉. 经济增长理论综述之一(读书笔记) [EB/OL]. <http://tiedingzou.blog.sohu.com/83525635.html>.
- [2] 武康平. 高级宏观经济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3] 刘 炜.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对我国实践的启示[J]. 江苏商论, 2006(11).
- [4] 邱国景. 社会资本边界及其最优选择[J].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0).
- [5] 陈 英, 王立云. 诚信与经济增长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 2007(8).
- [6] 殷德生.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 一个理论综述[J]. 南京社会科学, 2001(7).
- [7] 牛艳红. 论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7, 17(14).
- [8] 郭少新, 何炼成. 社会资本: 解释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思路[J]. 财贸研究, 2004(2).
- [9] 赵延东, 罗家德. 如何测量社会资本: 一个经验研究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05(2).
- [10] 卢燕平. 社会资本与我国经济和谐发展[J]. 统计研究, 2007(10).
- [11] 刘璐琳.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J]. 兰州学刊, 2008(1).
- [12] 杨 宇, 郝垂勇.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J]. 经济经纬, 2008(5).
- [13] 尹希果. 社会资本、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6(8).
- [14] 邱国景. 社会资本边界及其最优选择[J].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0).
- [15] 李 普, 林江鹏, 黄永明. 社会资本、诚信与经济发展[J]. 统计与决策, 2008(2).
- [16] 刘耀祥.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J]. 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07(4).
- [17] 郑耀群, 周新生.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东西部经济差距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07(8).
- [18] 张 庆, 康建英. 地区经济差距中的社会资本、交易费用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06(1).
- [19] 赵 晓. 地区经济增长为何大相径庭[J]. 新理论新观点新问题, 2004(24).
- [20] 张克中. 社会资本、诚信与湖北经济发展[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5).
- [21] 朱中华, 汪啸林. 从社会资本理论看江西信用环境的建设[J]. 企业经济, 2004(8).
- [22] 萨缪尔逊. 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 [23]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124.
- [24] 西尼尔. 政治经济学大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202 - 204.
- [25]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126 - 128.
- [26]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202.
- [27] 罗卫东. 论现代经济增长与“精神资本”[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11).
- [28] 李向民. 精神经济[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140 - 150; 180 - 189.
- [29] 鲁传一, 李子奈.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理论[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3).
- [30] 秦其文. 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J]. 经济研究导刊, 2007(11).
- [31] 韩顺法, 李向民. 经济增长的新范式: 精神资本的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 2009(3).
- [32] Acs ZJ, Audretsch DB, Carlsson B, Braunerhjelm P(2004). The missing link: The knowledge filter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ndogenous growth. Unpubl. Manuscript.
- [33] 叶 勤. 企业家精神的兴起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启示[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0(10): 16 - 20.
- [34] 肖建忠, 唐艳艳.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综述[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4(1): 2 - 7.
- [35]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 - 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8, 1002 - 1037.

- [36] Linghui Tang and Peter E. Koveos. Venture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August 2004: 161 – 171.
- [37]何予平. 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 C – D 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 [J]. 当代财经 2006(7) .
- [38]沈坤荣 孙文杰.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2) .
- [39]杨 宇 郑垂勇.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 [J]. 生产力研究 2008(18) .
- [40]高彦彦 杨德才. 区域经济增长的文化分析——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的崛起 [J]. 温州大学学报 2006 (4) .
- [41]余达淮 银 娟. 道家思想对东亚经济的影响及其伦理价值 [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12) .
- [42]廖飞. 地区发展差距的体制机制因素 [J]. 当代管理 2004(19) .
- [43]李应振 李玉举. 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体制机制因素分析 [J]. 技术经济 2008(4) .
- [44]姜作培 陈峰燕.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大问题 [J]. 中州学刊 2008(1) .

Review on the Impact of Soft Constraints on Economic Growth

HUANG Xiaoyong , CHEN Yunping

(Finance Institute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growth has always been the important researchful problem for economists. Following that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knowledge capital have been emphasized ,immaterial factors are also been attended by scholars. Literatures are referred about soft – restricting factors of economic growth such as social captial ,spiritual capital and system mechanism; then the comment is written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space for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spiritual capital; system and mechanism; economic growth

(责任编辑: 张秋虹)